

# 伦敦、纽约、东京 经济转型的经验及其借鉴

周振华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0002)

**内容摘要:** 目前上海正处于转型发展之中,日益呈现出许多非常规、非线性、非典型的新变化,同时也将带来许多充满悬念、令人疑难的新问题。为积极应对上海转型发展中的新变化与新问题,学习与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20世纪60~80年代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城市经济转型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转型的特有规律,更好地指导上海转型发展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 经济转型 经验借鉴 国际大都市

中图分类号: F29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11)10-0003-009

## 一、三大都市经济转型的基本历程

### (一) 伦敦

伦敦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在当代众多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中,只有伦敦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四次长波,历经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且重化工业阶段相对较长。20世纪20~30年代,伦敦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包括电器机械、汽车、飞机工业等,从而大大推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二战后的20多年,伦敦的制造业部门结构合理,工资相对较高,引进技术和工艺,专业化水平高。在若干工业部门中,伦敦占有相当大的产出份额。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伦敦进入了从重化工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转型,经历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

在经济转型的初期(20世纪60年代后期),伦敦原来强大的制造业呈现明显的衰退,相当数量的工厂关闭(直接造成20万人失业),部分企业向伦敦之外的地区转移,制造业部门出现大量失业。<sup>①</sup>导致伦敦制造业衰退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些是西方老工业化国家共有的原因,如国际竞争的加强、工厂现代化投资不足导致生产能力下降、特定时期的汇率对制造业出口不利等;但更主要的是发展空间狭小、土地价格昂贵等因素,在产业生产急需大规模空间时,城市有限空间束缚了其扩张。尽管伦敦的制造业整体处于下滑,但仍有一些相当强的高工资、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比如印刷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通讯产业。随着制造业的衰退,伦敦其他部门的就业岗位也在减少,比如建筑业、公用事业、运输和通信业、配送贸易等部门,在1973~1983年失去了21.8

收稿日期:2011-09-15

作者简介:周振华(1954-):浙江上虞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万个工作岗位。伦敦的就业人口从1961年的430万人降到1985年的350万人,出现了整个社会就业减少的局面。随着公司外迁和经济不景气,甚至还出现了城市人口减少的情况。为此,伦敦的经济处于长达20多年的萧条之中。

但在制造业就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就业人口处于大量减少的情况下,伦敦的全部服务业就业稳定在260万人左右(1978~1985年)。其中,有些服务部门的就业水平是下降的,特别是运输和通讯业;而银行、保险业等就业水平则是上升的。从1984年起,基于金融和生产者服务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一些产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1~1987年,商务服务业就业增加30%,个人服务业就业增加20%,银行、证券业就业增加13%。服务业就业增加,带动了整个社会就业的增加,在经历了25年的就业人口净减少后,首次出现就业净增加。伦敦就业人口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用了约15年的时间。1971年,27%的就业集中在制造业,68.6%集中在服务业;到1986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5%和80%。

### (二) 纽约

纽约是工业化时代典型的综合性城市,经历了从前工业化时代连接欧美的普通港口城市,到工业革命后成为全美最大的贸易口岸、商业银行中心和最大的工业基地,并发展为全国的首位城市。与伦敦、东京不同,纽约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一直以轻工业为主,基本上没有发展过重工业。纽约制造业兴起于工业革命初期,虽是多种产品的制造业中心(美国服装生产中心、糖加工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中心等),但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没有发展像钢铁、汽车、航空等类的重化工业。当美国工业于20世纪初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时,纽约的工业结构也没有变化,只是在轻工业内部出现由低端向高端的转移。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纽约的经济转型经历了大约10多年时间。

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类似于伦敦制造业衰退的诸多原因,纽约制造业开始衰退,而且衰落速度逐年加快,经济地位下降。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纽约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分别减少了9.2万、18.1万、26.7万人,下降比例分别为9%、19%和35%。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从1961年的140万人下降到1981年的68万人,1985年只有57万人,其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不到1/5。到1988年,进一步减少了10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的衰败,不仅是因为工厂的关闭和搬迁,还因为随着郊区化或大都市区化,纽约各大公司总部向外迁移。1965年,纽约的公司总部达128个,1976年已减少到84个。1969~1987年间,纽约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一半,制造业总部办公岗位减少了一半以上。随着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整个就业人口也趋于萎缩。在1950年和1960年,纽约的就业人数稳定在350万人左右,60年代期间一度增加到380万人,但1969年后,就业人员持续下降,1977年达到最低点,只有300万就业人口(包括在政府部门就业人数)。在此过程中,于1975~1976年还出现了财政危机。

但在财政危机过后,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开始在纽约迅速崛起。从1977年到1980年,白领行业的就业增加了17%,有一些行业的就业增长率更高,如计算机服务超过50%,管理咨询和公共事务、工程和建筑、会计、证券等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达20%~30%。在这一时期,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就业增长了7.7%,通讯和传媒增长了9.4%,商务服务业增长了24.7%,教育和科研机构增长了8.9%,娱乐、文化、旅游增长了7.4%,社会服务增长了3.9%。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使纽约的就业总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1987年就业人数达到360万。但其就业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195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达100万,服务业就业人数为50万;而到1987年,服务业就业人数达100多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为38.7万人。

### (三) 东京

在当前的国际大都市中,东京是城市功能最全的城市,被认为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世界大城市。东京与其南面的横滨和东面的千叶地区共同构成了闻名于世的“京滨叶工业区”,主要工业有钢铁、造船、机器制造、化工、电子、皮革、电机、纤维、石油、出版印刷和精密仪器等。东京的工业化进程,经历了初级工业化、重工业化、高加工化和知识技术高度密集化四个阶段。其中,重化工业阶段持续了大约15年时间。东京的制造业发展在1961年达到顶峰,其中约有一半是金属加工和机械产品制造。东京从重化工业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大约经历了20多年时间。

东京的经济转型,起因及其动力与伦敦和纽约相类似。当时,东京的制造业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大型制造企业管理的过度集中,造成东京用地紧张和土地价格攀升;二是城市中老工业区不断增加的高层居住楼和商务楼,并要容纳众多工厂,这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土地使用之间和不同人群从业的部门之间的日益紧张。因为工业用地的生产率大大低于商务用地的生产率。因此,1965~1975年,工业设施开始向东京以外的地方转移,服务设施进一步向东京集聚。与此同时,工业就业绝对量和比重趋于下降,而服务业就业绝对量和比重趋于上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5%下降到0.8%;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41.5%下降到34.3%,下降幅度超过7个百分点,在之后的3个10年间,又分别下降了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了7.4个百分点,后来的3个10年间上升速度相对较慢,从57%上升到74.2%。

但东京经济转型的过程形态与伦敦、纽约有所不同:一是总体比较平稳,尽管也一度出现财政危机。制造业失业情况不像纽约和伦敦那么突出,服务业也不像那两个城市发展得如此之快;总体就业水平也没有像那两个城市出现绝对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1970年东京有560万从业人员,30.2%在制造业,26.3%在批发和零售业,5.4%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21.3%在服务产业;到1980年,就业总数没有太大变化,但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到23.5%,服务产业小幅上升至22.7%,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没有增长迹象。二是东京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实际构成与纽约、伦敦不同。除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就业下降外,有相当部分是政府主动调整严重污染的工厂,特别是化工厂。因此,在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变化较小的背后,是该行业大幅度的重组。一方面,在老工业区被肢解的同时,政府指导化工和钢铁产业外迁,布局于东京南部;另一方面,制造业出现两种增长类型的发展趋势:一类是以手工为基础的小批量生产企业,特别是与时尚设计市场相联系的产业如服装和家具业,另一类主要是专业化、高新技术产业。

在东京经济转型中,1970年代开始转向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金融和生产者服务业联为一体的加速发展。从1977年到1985年,东京整个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增加71%。其中,某些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率极高,特别是信息、研发、广告业就业增长134%,房地产增长124%,法律服务增长30.7%,会计增长43.1%,其他社会服务增长93%以上,其他专业服务增长99%。从1986年到1996年,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的就业增长25%。到1990年代末,东京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60%以上。

## 二、三大都市经济转型的表现特征

### (一) 以产业结构的演变为为主线,并遵循着共同的演变轨迹

伦敦、纽约和东京都经历了制造业衰退、第三产业迅速扩张、生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不久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大都市的制造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中消费者服务业的部分行业经过一定增长之后也开始下降,而以金融业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开始表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但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上均未超过消费者服务业。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其特点是制造业和消费者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生产者服务业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上超过了消费者服务业。由此可见,在三大都市经济转型过程中,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成为中心城市以及整个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例如,1987年纽约生产者服务业和金融业提供的就业从1950年的50万增加到超过100万人,但批发和零售业就业人数则从70万人降到60万人,运输和公共事业就业从30万人降到20万人,建筑业就业从12万人降到1980年的7.7万人,到1987年又恢复到差不多12万人。美国学者论及纽约197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时认为,纽约经济的扩张,关键在于它生产者服务业的力量及其经济的国际化指向。

但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并非基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东京曾是日本最大的工业中心,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其工业地位逐渐降到第四位,同时大阪替代东京成为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总部、交易所、外资银行及金融市场在东京不断集聚,而大阪却逐渐丢失自己在金融市场的份额。这说明,工业中心与金融中心有着不同的生产者服务体系。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更有利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同时,可以避免工业撤离可能带来的城市经济萧条。纽约、伦敦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生产者服务业的迅速增长也主要依赖于金融中心发展。

### (二)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

制造业内部结构在变动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重化工业、传统制造业的衰落,而以服装、印刷出版业为主的都市工业,以及技术密集的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则趋于上升。伦敦、纽约和东京在制造业总体衰退的过程中,以印刷出版业、服装业、食品加工业等为主的都市工业始终处于稳步发展状态,在地区总产值中占有一席之地,且这些行业的企业规模都呈现出小型化的特点。东京的工业结构以印刷出版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电机、通信机械、精密机械和运输机械等作为主导部门,印刷出版业、机器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等居全国首位,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过衰退的印刷出版业销售额占到全国的50%。而在纽约市的制造业中,服装业产值比重最高,1997年达27.48%,比同期全美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印刷出版业居第二位,产值比重为13.72%,也比全美平均水平高5多个百分点;同期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比重,分别只有7.28%、2.21%和2.15%。

### (三) 经济增速放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一个台阶

在转型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于传统产业调整和转移速度较快,而新兴产业培育速度较慢,容易出现产业发展的真空状态,导致增长速度下滑;另一方面,在传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产业投资规模大,不仅投资形成的新增产能能够创造GDP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其大量投资本身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当产业增长的重点转向服务业时,不仅投资规模明显缩小,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同时受产业特征的影响,服务业增长速度通常低于制造业。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就业人数绝对量的下降。从1978年到1985年,伦敦的就业绝对量下降4%。1985年伦敦失业人口比1960年代中期增长10倍,从4万人增加到40万人,如果包括未注册的失业人口,这一数字会更大。除了制造业就业人口大幅下降外,在公共服务业就业也下降10%。其他部门,如建筑业、公用事业、运输和通讯业、配送贸易等就业也在减

少。在纽约,从1970年到1980年,总就业水平绝对值趋于下降,从370万人降到300万人。其中制造业就业减少35%;总部办公室职位减少41%;办公室就业总体下降15%。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业的就业从1976年起也开始减少。

#### (四) 结构调整的摩擦较大,经济运行呈现相对不稳定性,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伦敦、纽约和东京在经济转型中,不仅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收入分配结构、人口结构、城市空间结构等也都随之变化,这使得经济运行呈现相对不稳定性的特征,社会问题日益显现。例如纽约,除失业增加外,制造业工资水平也明显下降。由于纽约缺少像钢铁、汽车、航空等关键产业,其制造生产领域的平均工资从未达到过全美的最高水平。在1970年前后,纽约的平均工资达到相对最高水平,制造生产领域的平均小时工资是全美的101.2%,但到1982年,纽约的制造生产领域的平均工资降到全美平均工资的87.6%。另外,与产业结构调整相联系,在1945~1980年间,约有200万中产阶级居民迁出纽约市,这种人口空间迅速为北上的黑人和拉美人所填补,使纽约日益贫困。由于原有的经济稳态结构被打破,新的经济稳态结构尚未形成,经济系统处于非稳状态,因而对外部影响比较敏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例如伦敦在经济转型中,一些比较弱的制造业部门在进口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竞争力越来越差,导致大量倒闭和失业。纽约的若干产业部门也是如此。

#### (五) 由于转型的成本与收益不同步,均出现了“间歇性”财政危机

与传统发展阶段不同,转型阶段的投入主要用于打基础,因此不仅各种要素的投入量大,而且短期内产出效应不明显,转型效益往往呈现滞后性。纽约在经济转型中,由于经济的衰退、公司总部的大量外迁和人口的流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更为不幸的是,纽约市政府推行了“赤字财政”政策,到1975年11月终于引发了纽约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财政危机。为此,纽约市制定并实施了多种战略,如工业园区战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振兴纽约外向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部门,包括积极发展旅游业,强化纽约的国际中心地位,全面改善该市的投资环境和生活质量,努力使人口、企业回流。经过重组,纽约市的经济于1981年初基本上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比预期的1982年提前一年实现预算平衡,到1980年代中期已略有盈余了。东京在经济转型中,也同样带来了财政危机,于1975~1978年间出现了101万亿日元的财政赤字。为此,东京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重点措施是政府裁员、压缩工资,如裁员9255人,包括服务业裁员,征收消费税,减少或取消津贴等。1979年东京财政赤字减少,1981年已转为有31万亿日元的盈余。

#### (六) 各城区间发展不平衡

伦敦、纽约和东京在经济转型中,总的趋势是制造业部门收缩与服务部门扩展,这对中心城区与外缘城区的影响是不同的。尽管中心城区在经济转型初期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与冲击,不仅有工厂关闭和外迁,而且也会有制造业公司总部外迁及中产阶层人士移居郊区等,从而导致内城衰弱的情况。但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大量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重新集聚到中心城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纽约的曼哈顿。生产服务业的聚集、交通通讯手段的更新,强化了曼哈顿所固有的高度集聚性、高度枢纽性、高度便捷性和高度现代性等特征,使曼哈顿成为当之无愧的纽约市、纽约大都市区以及全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核中之核。而另一方面,纽约市外缘的其他四个城区经历了真正的衰落,制造业的衰退与迁移对其影响是最大的。

### 三、上海与三大都市经济转型异同点比较

上海当前的转型发展,与三大都市当时的经济转型相比,在发展阶段、城市属性以及外部环境条件等方面,既有共同点,也有较大的差异。或者说,与有些城市有类似处,而与另一些城市又有所不同。通过与三大都市经济转型的异同点比较,从它们经济转型的过程及其实际效果的经验考察中,我们可以找出上海转型发展可能面临的有利因素或不利因素。

#### (一) 城市转型的国家背景

一个城市在经济转型时,其国家发展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化,对其是有较大影响的。纽约与东京在经济转型时,其国家发展均处在上升期,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居于全球前列。伦敦的经济转型,则处于英国国际地位逐步下降的背景下。显然,在一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并具有相当话语权的背景下,实行城市转型有诸多有利条件,如国家更希望将这些城市发展列入国家战略予以支持,国家的日益高涨的声望也有助于这些城市更多地吸引世界资源集聚,从而会给城市转型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目前,我国经济经过持续的高增长,已形成世界第二大规模的经济体,并且国际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显然这对上海转型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 (二) 城市转型的国内背景

伦敦、纽约和东京在当时经济转型中,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均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例如,日本在1950~1970年代末已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则开始转向后工业化阶段。因此当三大都市在经济转型时,其国内的服务业发展也已达相当的水平,其比重相差不是很大。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制约也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三大都市的经济转型中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吸引了外来服务企业的集聚所致。显然,这是十分有利于其转型的。与此不同,我国目前尚处在工业化中期,服务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存在较多制度环境的制约。相比之下,这对上海转型发展是不利的。

另外,国内区域经济结构的状况对城市转型也有较大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区域经济结构比较平衡。因此,国内区域经济结构对伦敦经济转型的影响不大。与此不同,在美国区域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上,从19世纪初到20年代,东北部繁荣一时;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中西部城市又脱颖而出。二战后,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兴起后,高科技产业所占比重逐渐加大,西海岸得以长足发展,“阳光带”城市成为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崭新增长点。相形之下,东北部和中西部这两个老工业区却增长乏力,被人们相应冠之以“冰雪带”的称谓。美国这一时期全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对纽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纽约的传统地位受到一定的削弱,并日益受到西部大城市的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纽约经济转型中的摩擦与冲击力度。当前,我国也正处于区域增长格局大变动之际,并已形成“西高东低”的态势,国内城市竞争也趋于白热化,这将给上海转型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和冲击。

#### (三) 城市功能条件

通过三大都市经济转型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相对单一的城市功能有利于城市的转型。纽约是国际大都市,但不具有首都功能,与东京、伦敦相比,城市功能相对单一。同时,纽约从发展伊始就充分考虑本身的资源优势,扬长避短,不追求大而全,特别是没有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因此城市的发展并没有遇到严重的资源约束和城市病。而且,纽约与美国其他大城市的间断性不强,加上与周边城市的合理分工,所以纽约在经济转型和城市变迁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相对伦敦、东

京要少。上海与纽约一样,也不具有首都功能,更多的是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转型发展。但与伦敦、东京类似,上海曾是制造业基地,制造业门类齐全,重型化程度较高,城市发展遇到较严重的资源约束和城市病,从而加大了转型发展的难度。

#### (四) 城市转型的作用机制

三大都市在经济转型中,市场机制始终是推动其转变的主导力量,而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实现转变的有力保障。在三大都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自始至终没有明确提出“增长方式转变”的话题,基本是顺应市场规律的调整。尽管如此,在经济转型中面临产业调整、失业,以及财政危机时,政府也都通过制定城市战略规划、环境保护法规、产业扶持政策、社会保障措施等进行有力的引导和扶持。特别是日本政府,在东京发展为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由于政府的积极作为,东京的产业结构在由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出现类似伦敦、纽约的城市经济衰退。即便在市场主导力量很强的纽约经济转型中,纽约市政府在制造业领域也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房地产税减征5年计划(前3年减50%,第4年减33.3%,第5年减16.7%),免除商业房租税(前3年租税全免,第4年免66.7%,第5年免33.3%)。同时,纽约还实行了城市工业园区战略,主要表现在“袖珍工业园区”(依托该市基础设施完备但被废弃的小区,利用联邦资金建设商业大楼,租给小型制造企业,巩固纽约经济结构多样性的传统优势)和“高科技产业研究园区”(利用纽约市众多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综合优势,研究开发高科技产品,以适应后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为促进服务业发展,纽约市政府实施了曼哈顿优惠能源计划(期限12年,前8年电费减少30%,以后每年减电费20%)。而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能级提升,则通过对外投资兼并收购海外企业等方式,将这些边际产业向外转移,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上海在转型发展中,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助于克服转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经济震荡。但问题是,政府如何在顺应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行积极引导和扶持的政策措施。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减少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

#### (五) 城市转型的主要路径

纽约、伦敦、东京的发展都曾面临“城市病”的困扰,直接阻碍其产业调整和重新布局。因此,在经济转型中,都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将单核中心转变为多核中心,从而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城市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可以说,没有空间结构的转变,就不会有增长方式的转变。伦敦作为最早形成的国际大都市,也最早遭遇了“城市病”的困扰。它们最先认识到,由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发展并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必须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引导。之后,纽约、东京、巴黎等众多大都市都效仿伦敦,通过编制城市规划来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有序转变。

上海已充分意识到在转型发展中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并已采取措施实施郊区新城建设。这一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要注意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在时间上的有机衔接。如果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滞后,上海将丧失为产业调整提供支撑和保障的时机。因此,必须加快郊区新城建设步伐,推动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有序转变。

#### (六) 城市转型的区域条件

一个大国难以摆脱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再向后工业阶段过渡的工业化路径,但一个城市可以跳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里的关键因素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纽约依据自身的资源特点始终没有发展重化工业,伦敦和东京虽然经历了重化工业阶段,但

都在重化工业阶段的中期而非后期提前完成了向后工业化的转变。这种跨越式发展模式的实现,离不开大都市圈的协调发展。伦敦、纽约都市圈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东京都市圈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都市圈内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格局,可以突出中心城市的资源优势,延长其产业链;可以通过周边城市工业的发展为中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提供市场空间;可以缓解中心城市发展中产生的“城市病”,等等。例如,金融和生产者服务业在纽约的高度集聚,得益于纽约与周围城市合理的功能分工和产业链协作。在纽约都市圈中,纽约的金融、贸易功能独占鳌头,费城主要是重化工业比较发达,波士顿的微电子工业比较突出,而巴尔的摩则是有色金属和冶炼工业地位十分重要,同时,还有华盛顿的首都功能。纽约市一直十分重视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将公司总部作为加强这种联系的纽带,通过发挥大都市的整体优势来加快市区的振兴步伐。上海处于长三角城市群之中,并作为其核心城市,与纽约、伦敦、东京相类似,对转型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分工还不尽合理,产业链协作也较弱,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和过度竞争,不利于上海转型发展。因此,上海要实现转型发展,不容忽视同周边地区和城市的关系,必须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并发挥其核心城市作用,与周边城市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为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产业链延伸、人口密度的下降等提供保障。

### 四、三大都市经济转型的启示

#### (一) 谨防“转型综合症”

伦敦、纽约、东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都发生了与以往根本不同的重大变化,经济系统的稳态被打破,甚至出现较大经济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患上“转型综合症”,具体表现为:(1)因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或增长明显下滑,经济地位下降,形成严重的失落感,甚至焦虑感;(2)因经济转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或转型最终结果的预期不确定,心里没底,从而对转型前景感到迷茫、对当前开展的工作感到不踏实;(3)因经济转型中成本投入与收益获取的不同步,难以在短期内见效,容易对已采取的政策措施产生疑惑,从而在工作中摇摆不定;(4)因经济转型中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而传统的思维惯性和工作方式难以适应,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难以有效应对,感到束手无策,或者是急病乱投医。在经济转型初期阶段,这种“转型综合症”在所难免,但必须及时加以调整和克服。

#### (二) 守住三条底线,保持平稳转型

从伦敦、纽约、东京经济转型过程看,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保持转型的相对稳定,避免出现经济严重恶化,关键是守住三条底线:(1)保持社会总就业水平增长,每年都有净增就业岗位,特别是保证较高的毕业大学生就业率;(2)保持实际收入增长,且实际收入增长水平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保持财政收入增长,不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只要守住了这三条底线,就能保持较平稳的转型发展。

#### (三) 观察四个主要标志,衡量转型发展的进展

上海作为迈向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经济转型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维度上:(1)城市功能高度化,具体反映在枢纽性大平台建设、资源要素集聚与扩散的流量规模、功能性机构的集聚程度等方面;(2)经济结构合理化,具体反映在产业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所有制结构、城市空间结构等优化方面;(3)运行质量集约化,

具体反映在财政收入、经济效益、创新成果、节能减排、居民收入、就业等方面; (4) 发展环境优质化,具体反映在市场环境、生态环境、生活居住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通过观察这四个主要标志,衡量与判断转型发展的进展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明确阶段性目标,逐项落实。□

注 释:

①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一般不采用产值指标,通常用就业水平、结构指标来衡量城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情况。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都是如此。

## Experience of London , New York , Tokyo'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Reference for Shanghai

Zhou Zhenhua

**Abstract:** At present , Shanghai is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A number of unconventional , non - linear , atypical new changes will gradually appear. And many new problems full of suspense and difficulties will also been brought to us.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changes and new problems ,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 especially typical cases of urba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London , New York and Tokyo during the 60s - 80s of 20th century. It is helpful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unique rules and efficiently guide the practice of urba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Keyword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 Reference